

第五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 “史前时代的中国西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然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年11月1日至4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云南省文物局主办,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第五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史前时代的中国西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顺利召开。来自以中国西部15个省、市、自治区为主的17家科研院所、6所高校及美国、加拿大相关研究机构的考古学者共7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另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科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云贵高原到南海之滨的文化互动与族群迁徙、中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四个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24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在学术交流的基础上,西部各省区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就开展省际、校际之间的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会议确定了第六届考古协作会的承办单位,并决定在明年上半年出版《第五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史前时代的中国西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也是西部考古协作会举办五届以来的第一本论文集。

一、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

(一) 西南地区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闵锐先生首先介绍了2008年云南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情况。1957年、1978年曾先后对海门口遗址进行过两

次发掘,因为种种原因,对海门口遗址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2008年1月至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与该遗址有关的一系列学术疑问由此逐渐明晰。海门口遗址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中心区面积约20000平方米,第三次发掘面积1395平方米,出土遗物可分为陶、石、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共八类,清理木桩柱和横木4000多根、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前后连续的三期,第一期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为青铜时代早期,第三期为青铜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这为建立云南滇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同区的大理银梭岛遗址相比,海门口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之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云南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及族群的迁徙很有帮助。同时,剑川海门口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碳化的稻、粟、麦、稗,说明粟作农业的南界已经延伸到了滇西地区,遗址中稻、麦共存的现象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农业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谢广维先生介绍了今年6月至10月广西贵港贵城遗址的发掘及收获。此次发掘发现了西汉、东汉、两晋南朝、隋唐、

宋元及明清时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其中以汉代遗存最为重要，清理出宽达 18 米的人工河、水井、长沟、灰坑等遗迹及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陶器。唐宋时期的遗迹主要是大型建筑基址，另有大量莲花纹、兽面纹瓦当等。这次发掘收获较大，其中汉代遗存为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编年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地层依据，出土的大量高等级建筑材料以及人工河的发现，为寻找秦桂林郡、汉郁林郡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安益、杨清平先生，结合近一年来广西左江流域发现的贝丘遗址的新材料，对广西河岸贝丘遗址进行了综合研究。广西河岸贝丘遗址目前共发现 30 余处，主要分布在黔江、邕江、郁江、左江、右江等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河岸两旁，地域范围大致西起龙州，东至桂平，北至象州，南至宁明，其中南宁、邕宁为此类贝丘遗址的中心分布区。根据该类遗址的文化内涵及特征，广西河岸贝丘遗址可划分为三个文化类型：顶蛳山类型（距今 8000 ~ 7000 年）、南沙湾类型（距今 6500 ~ 5500 年）、冲塘—何村类型（距今 5500 ~ 4000 年）。其中顶蛳山类型、冲塘—何村类型属于左右江中下游—郁江贝丘文化圈，南沙湾类型属于黔江贝丘文化圈。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方刚先生介绍了重庆嘉陵江流域近两年来的考古工作。随着嘉陵江流域梯级电站的开发，重庆考古所陆续对嘉陵江、渠江、涪江流域的部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位于涪江右岸一级阶地之上的合川河嘴屋基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文化性质单纯，是峡江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中较为典型的遗址。方刚先生在该遗址典型器物进行类型学比较分析后，重点探讨了河嘴屋基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具体说来，河嘴屋基遗址 A 组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 5500~4000 年之间。B 组遗物大部分属于石地坝文化第二至四期，时代在商代中期，下限可至西周早期。以合川为中心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地区，是峡江地区古代文化汇流的“洼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同志通报了四川省于 2008 年在康藏南线及甘孜州进行的最新考

古调查与发掘。康藏南线的调查共发现新文物点 750 处，其中卡心坝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从所采集陶片的陶质、陶色、纹饰等特征来看，与大渡河流域的同时期遗址有相似之处，估计年代为距今 4000 年左右。卡心坝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康藏南线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为探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为研究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等地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线索。甘孜州的考古新发现以宴尔龙、卡莎湖两个石棺葬墓地的发掘最为重要。宴尔龙石棺葬墓地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雅德乡宴尔龙村，地处鲜水河支流——达曲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之上。此次发现的石棺墓主要分布在西区，共计 12 座，随葬品包括人骨、铜戈、石斧等。对卡莎湖石棺墓地的研究，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包括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人骨的病理研究，墓葬排列和列内、列间亲缘关系的研究等在内的人类学方法。

（二）西北地区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程林泉先生介绍了西安北郊张家堡汉墓群的发掘情况。西安地区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汉长安城东侧及东南的龙首原是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此次张家堡汉墓群的发掘是此区域内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次。该墓群以小型墓为主，形制主要为竖穴墓道洞室墓（包括土洞墓和砖室墓），有少量斜坡墓道洞室墓，部分墓葬有耳室或小龕，葬具多为木棺，个别棺外有椁。根据墓葬形制、打破关系、出土器物组合及器型特征，这批墓葬可分为六期。第一期年代为西汉早期，第二期 of 西汉中期，第三期为西汉中晚期，第四期为西汉晚期，第五期相当于新莽或稍晚，第六期为东汉时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志勇先生介绍了近年新疆汉晋考古的新发现，其中以 2007 年 8 月在库车县发掘的十六国时期的一批墓葬最为重要。这批墓葬以砖室墓为主，竖穴墓较少，砖室墓又可分为斜坡墓道穹隆顶双室墓、斜坡墓道穹隆顶单室墓和长方形单室墓三种。从墓葬形制分析，这批墓葬与我国内地及河西地区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敦煌祁家湾墓地、大通上孙家寨墓

地的砖室墓十分类似,在墓葬的构筑方式、雕砖风格等方面尤其与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极为相似。这批砖室墓的年代推定在晋十六国时期,约在 3 至 4 世纪末或稍晚。砖室墓的墓主可能是深受传统汉晋文化影响的龟兹国贵族,抑或是居住在龟兹地区的汉地吏民、屯戍军吏或河西豪族移民。库车晋十六国砖室墓的发现,填补了新疆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为研究和探索古代龟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龟兹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文化研究、逐步认识和廓清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补证并揭示有关历史文化史实具有重要价值。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先生对甘肃地区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进行了介绍。

二、区域专题研究

主要涉及大渡河、渝西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云贵高原至岭南南海之滨的文化互动、澜沧江流域早期青铜时代与北方草原、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及族属等专题。

(一) 大渡河流域、渝西地区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南地区、云贵地区之间交往的必经之地,也是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2005 年马尔康哈休遗址的发掘使大渡河上游的史前文化面貌已逐渐明晰,但中游的文化发展序列仍不清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2006 至 2008 年对大渡河中游麦坪遗址的发掘,为这一区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麦坪遗址位于大渡河中游南岸较为平缓的谷地之上,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这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等遗迹,出土器物以陶器、石器为大宗。一期陶器器形较大,以平底器为主,不见圈足器,二期陶器以侈口鼓腹的罐类最多,器形相对较小,开始出现圈足器。石器中打制与磨制并存,磨制石器的器形以斧、锛、刀、凿为主,另有箭镞和网坠。打制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石核等,同时还发现了以黑色燧石为原料的细石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志岩同志认为,麦坪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较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麦坪遗址发现的房

址已经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村落,其布局与文化内涵为大渡河流域开展史前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该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对四川细石器是一个补充。另外,大渡河流域是巴蜀文化、石棺葬文化和大石墓文化相互交汇的重点地域,理清这一范围内文化发展的脉络,将有利于解决横断山区史前文化的交流问题和史前人群的迁徙问题。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白九江先生结合渝西长江流域及嘉陵江流域近一年的考古工作,对渝西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已发表的材料看,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先秦考古文化面貌已经可以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尽管其间还存在许多缺环。总体看来,渝西地区先秦考古文化总体特征与三峡地区更接近,而与成都平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 云贵高原至岭南南海之滨的文化互动

关于云贵高原至岭南南海之滨的文化互动与族群迁徙,多位学者进行了讨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先生首先介绍了云南东南部的个旧石榴坝、黑玛井、冲子皮坡、蒙自鸣鹭、元江打蒿陡及文山广南牡宜等几个地点的发掘材料,通过墓葬及随葬品的对比分析,蒋志龙先生把本区的青铜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元江打蒿陡墓地和个旧石榴坝墓地材料为代表,晚期以个旧黑玛井墓地材料为代表。早期遗存以长柄半圆刃铜钺、不对称型铜钺、靴型钺为典型随葬品,晚期则以几何印纹硬陶和汉代南方青铜器为特征。云南东南部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面向东南沿海,背靠高原内陆,从地理位置来看正好处于云贵高原与岭南地区的结合地带。战国以前,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区域文化的特征,并与相邻的中心文化有联系,但是这种区域文化特征并没有突破通海至建水一线,而是在东南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分布区。战国后期至汉代,以几何印纹硬陶和汉代南方青铜器为代表的遗存成为这一区域的主流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广泛见于广州、广西及越南红河三角洲的同时期遗存中。这种现象说明,战国至汉代,除石寨山文化以外,在云南东南部还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汉文化对云南本地文化的影响方式是多源的。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帆先生的发言围绕史学界关于句町、漏卧势力范围的争论展开。史界一般认为句町王的活动中心在广南一带,其控制地区包括广西西部及云南文山州的大部,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当时可能也在句町的控制之中。关于漏卧的县治所在,说法有两种,云南史家认为在今罗平一带,而《华阳国志》校注者认为在今师宗一带,这些说法均凭推断,都不太确切。云南省考古所最近在文山州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及红河州泸西县中枢镇石洞村的调查与发掘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实物依据。杨帆先生主要对广南牡宜汉墓及泸西石洞村青铜墓地的族属进行了探讨,对与广西西林铜鼓墓有关的争论也作了综合分析。他认为广南牡宜汉墓属句町部族的遗存,石洞村、大逸圃两个墓地的性质、文化面貌相同,年代上限均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下限石洞村墓地较大逸圃稍晚,为东汉初期,大逸圃墓地的年代下限为西汉后期。石洞村、大逸圃两个墓地的主人是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的早期氐羌系统民族。至于广西西林铜鼓墓的族属,就现有材料来看,应属漏卧族群。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飞先生就贵州发现的崖葬作了专题发言。根据他的研究,贵州的崖葬可分为悬棺葬和岩洞葬两大类,可将之分为即黔东南区与黔中及黔南区两大区域。悬棺葬集中分布在黔东南,黔中及黔南区则以岩洞葬为主。关于贵州崖葬的年代及族属,李飞先生认为,黔东南区悬棺葬年代早可至六朝,宋明时期较为流行,下限可能到清代。其族属应是六朝以降“五溪蛮”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后裔“峒人”、“冉家蛮”、“猺猪”等的遗存,这类葬习至清代前后即已式微。黔中及黔南区的岩洞葬,年代多数为明清时期,其族属应是唐、宋以降活动在当地的苗、瑶、仡佬等族群的部分支系之遗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郑君雷先生向大会作了题为《西于史地与南越国史和安阳王的几个问题》报告。他从史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结合考古材料,围绕汉平南越国的历史背景,对西于王、安阳王及西于、安阳两个封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综合探讨,内容涉及西于与西瓯名实、西于王与安阳王关系、西于王都和西于徙地、安阳国的建立及灭亡时间、安阳国的族群基础、蜀族迁移的路

线、安阳王的历史贡献等。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汉代西于王与安阳王及其与他们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奠定了红河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在华南海岸线并峙的历史地位。

关于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化的探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旭先生作了题为《试论野石山文化》的发言。野石山遗址位于昭鲁盆地南部边缘,200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集中出土于第 层,陶器数量最多,石器和铜器较少。陶器器类主要有罐、碗、盂、瓶、钵、匜和盖,石器均为磨制石器,器类有镞、斧、镰、刀、纺轮等,其中刀和镞较具特点。铜器只发现铜镞和铜锥各一件,都是造型简单的小型工具。通过初步整理和研究,刘旭、孙华先生认为,野石山遗址代表了青铜时代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的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有必要将其单独命名为“野石山文化”。从昭鲁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来看,野石山遗址的文化特征接近该区已知较早的鸡公山文化,而营盘村乙组 红营盘墓地的文化特征更接近于年代最晚的石寨山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从年代上看,红营盘墓地的年代不过春秋时期前后。野石山遗址的年代,经碳 14 测年在前 1100~前 900 年间。这个数据与鸡公山文化的测年数据前后衔接,根据这个数据推断,野石山遗址的年代当在公元前 1100 至公元前 900 年,早于红营盘墓地。关于野石山文化的结构和源流,刘旭、孙华先生认为,野石山文化中陶瓶、翻沿罐等陶器,在当地更早的鸡公山文化陶器中占据了较大比例,这类文化因素因当来自鸡公山文化。而夹砂灰陶或黑陶的近似盆形的侈口大口罐、单耳和双耳小口罐、圈足碗(豆)等占了野石山文化全部陶器的 65%以上,是该文化的主体因素,这类文化因素应当另有来源。

(三) 澜沧江流域早期青铜时代与北方草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志清先生向大会通报了他的研究成果。澜沧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上游的昌都卡若遗址,年代距今约 5000~4000 年,中游地区主要有新光类型、芒怀类型、石佛洞类型和曼蚌因类型,总体而言,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类型的时代较中

下游地区早。从生业模式来看,卡若、新光、石佛洞类型属于农业经济,芒怀、曼蚌因类型属于渔猎采集经济,二者之间无论是聚落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传统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从文化特征看,澜沧江流域各个先秦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特点。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金龙先生重点探讨了分布于滇西、滇西南的芒怀文化与嵩(昆明)、哀牢、百濮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芒怀文化、嵩(昆明)、哀牢、百濮四者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年代等问题的梳理及对比,他认为,芒怀文化、嵩(昆明)、哀牢及百濮四者之间的分布范围重叠相同;芒怀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嵩(昆明)的相似,嵩(昆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与哀牢相似,哀牢的服饰、纹身等又与百濮相同,四者之间的特征前后逐一首尾相衔;四者之间的年代也基本逐一首尾相衔。所以,芒怀文化、嵩(昆明)、哀牢与濮当是不同时期对同一百濮系统民族不同阶段的称谓。

(四) 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及族属

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分区研究及铜鼓的研究方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明华先生作了题为《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与西南夷君长》的发言。他以盆地为单位,把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划分为 13 个片区,分别是滇东北昭通、黔西地区;西昌地区;永胜、宁蒗、盐源、盐边地区;滇池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地区;祥云盆地;洱海地区;迪庆高原地区;保山、昌宁、腾冲等地;泸西、罗平、师宗;广南盆地和元江河谷盆地及滇南。各个不同的地区单元分属不同的族群。他认为,据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结合文献记载,一一确定这些族群的分布位置,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仍将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内容。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邱兹惠女士介绍了西南铜鼓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关于铜鼓的诸多假设如西南铜鼓的起源地点与时间、早期铜鼓的传播路线、万家坝鼓与石寨山鼓器形的演化、早期铜鼓的文化内涵等进行了剖析。她认为,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还无法阐述早期铜鼓的起源问题。早期铜鼓呈直线传播的假设证据不足。万家坝鼓

与石寨山鼓是同时共存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与早期铜鼓都有接触,其文化内涵是多元的。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

从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来看,西部考古学研究正逐渐表现出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趋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锐宇先生以十二桥遗址、清源遗址和石佛洞遗址为例,对商末周初成都平原、乌江上游和澜沧江下游的动物考古进行了宏观观察。通过动物种属的鉴定及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环境变迁方面,3000 年前的成都平原、乌江上游地区较现在要温暖湿润,澜沧江下游变化不明显。在动物群多样性方面,成都平原动物群的多样性明显不及乌江下游和澜沧江流域,动物群的垂直分布不明显,这可能是受海拔、纬度、温度的影响。在生业方式方面,成都平原家畜(主要是猪、狗、牛、马、羊)饲养业发达,乌江上游以渔猎经济占主导,澜沧江流域渔猎经济占重要地位,淡水捕捞则是重要补充。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智彬先生结合忠县中坝遗址的考古材料对环境考古、动物考古、盐业考古、植物考古、碳¹⁴检测及体质人类学与 DNA 检测等学科方法在此次发掘中的运用作了介绍。在归纳总结忠县中坝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近现代不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和特征,初步建立起渝东峡江地区距今约 5000 年时间范围内分期断代的标尺的基础上,他的研究对该遗址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荆志淳教授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在阐明物的物性和物质性理论的基础上,对用玉的物质性进行了探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James Stoltman 教授向大会作了题为《陶器的岩相学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的报告,介绍了陶器岩相学的原理及其在考古领域中的运用。